

编者按：吴黎耀华出生在大陆，青少年时期定居台湾，后到美国深造，担任美国联邦图书馆资讯科学委员会委员(由六任美国总统任命及参议院认可)多年。她在华人社会是一面成功从政的旗帜。本文摘自其自传《做不完的美国梦——六任美国总统顾问传奇生涯》，讲述了她在美国奋斗的片段，从中亦可看出中美关系的时代变迁。

# 吴黎耀华： 六任美国总统顾问



吴黎耀华与尼克松合影 资料图片

## 突然接到来自白宫的电话

1973年的某天，突然接到一通来自白宫的电话。通知我尼克松总统有意任命我为“美国联邦图书馆及资讯科学委员会”委员，希望征求我的同意。

基于“人人有均等机会享用资讯”的原则，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一条法令，正式成立了这一永久性的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委员会有十四名委员，外加国会图书馆馆长为当然委员，共十五名成员。委员经总统提名后，须经参议院认可，一般任期五年。虽然委员会在1971年就已召开第一次会议，但十五名成员到1973年才任命齐全，我的任命是属于第一届委员会中十五位成员之一。

我表达了接受尼克松总统提名的意愿后，就开始一连串的作业程序。这个过程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美国总统属下的委员会，大大小小，数以百计，一般委员任期与总统同进退，而我的委员任命需得参院认可，任期也不受总统任期的影响，不需和总统同进退，这些程序显示出我们委员会的重要性。因此我的第一期五年(1973-1978)之中，担任过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位总统的顾问委员，1978年我期满后，1980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又重新两度给我任命。

尼克松总统给我的这项任命，具有多重的意义。第一，我是委员会里首位具有少数族裔背景的委员，当时委员会里是清一色的白人，甚至连一位非洲裔也没有；第二，我是唯一的亚裔第一代移民获得美国总统任命的委员；第三，当年30多岁的我是最年轻的委员，也是三位女性委员之一；第四，我是唯一的学校图书馆馆长，其他成员除了来自公共图书馆系统，或资讯科学专家外，即各行各业人士；第五，我具有加州两大教育系统(洛杉矶联合学区及洛杉矶社区大学)的专业经验，在1987年后，又以十几万票当选洛杉矶市社区大学系统的教育委员，而成为唯一担任地方民选公职的委员。

从这些特质来看，总统的这项任命的确令许多人跌破眼镜，大感意外。我的美国土生土长的

朋友和同事，对我这位留学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既非小留学生又非美国生长的亚裔，居然得到总统的赏识，感到惊讶。我只是微笑以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焉知我早在留学生时代就投入尼克松总统的竞选阵营，从第一次竞选总统，到竞选加州州长，直到总统竞选成功，入主白宫，一路走来都有我在支持他，参加他助选活动的足迹。所谓“有耕耘才有收获”，就是这个道理。

## 首度大陆行见到邓颖超

1984年，我收到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资深外交官王炳南的正式公函，邀请我和丈夫允祥两人访问中国大陆。当时我是里根政府任命的联邦图书馆资讯科学委员会委员，也是唯一华裔委员，因此备受友协的重视和礼遇，获得与联邦级官员对等的国家规格的接待。

我们刚抵北京，接待人员即刻询问我们下榻钓鱼台国宾馆或是北京饭店的意愿，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它较靠近市区，人民大会堂、王府井等处都近在咫尺。每天一部奔驰轿车在饭店门口等着接送我们去拜会官员。司机告诉我们，你们真是受到国宾般的礼遇，全北京城就总共五台奔驰车而已，连副总理都还没机会坐上。

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套房里，每天鲜花、水果、点心、茶水饮料供应不绝。此外，友协也非常周到，派遣周恩来总理的前英文秘书，也是留英学者——沈若云女士陪同我们，做我们的翻译。没想到我和允祥中文基础相当坚固，也通数种方言，结果，她非但没机会做成翻译，反而从我们这里学到一些现代美语。这些礼遇让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王炳南会长安排了许多拜会，其中一天是邓颖超接见我们。那时她身体好像有些不适，但是见到我们时，异常兴奋，谈兴很高，主题正是两岸同一问题。

邓颖超和我们谈得很深入，也很诚恳，允祥也谈及一些台湾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也从中穿插有关美国和台湾的教育文化现状。1984年当时，他们对台湾的情况的确所知不多。大家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有人来提醒邓主席该休息了，她回说：“不需要，我今天很高兴，想看看阳光。”坚持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啊，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很温和。”

在整个会谈中，我们都尊称她为“主席”，但国内的人都称她为“邓大姐”，很得民望。她和周恩来终生奉献给国家，两袖清风。邓大姐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身穿朴素套装，短发齐眉，态度诚挚亲切，平易近人。短短不到两小时的交谈，我们已可以了解到她深得民心的道理了。

## 邀请福特夫人访洛杉矶华埠

由于亚裔妇女福特助选委员会的产生，使我孕育出邀请福特夫人访华埠的念头。起初打算邀请总统本人造访华埠，可是福特竞选总部打了回票，说根本不可能。然后，我即刻想到第一夫人，以我们妇女助选团名义去邀

请，应该是顺理成章。

主意既定，就尽速行动。我联络了当时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机要秘书苏珊，询问第一夫人的行程及到访洛杉矶华埠的可能性。好消息很快传回来，贝蒂·福特十月下旬在南加州有行程，安插拜访华埠活动不成问题。于是，我赶紧联络当时罗省中华会馆主席黄国如、商会主席冯惠林及其他社区领袖共同商讨欢迎接待事宜，也邀南加工会会长司徒理担任欢迎会司仪。大家都异常兴奋，对我的活动能力大为赞赏。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夫人首次拜访罗省(洛市)华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一项荣誉，表示华埠选民也开始受到重视。华埠大佬们紧锣密鼓开始忙碌起来，准备策划一个让贝蒂·福特难忘的欢迎会；许多社区领袖纷纷向我“报名”，希望加入第一夫人到访的欢迎之行列。我也特别邀请了旧金山共和党兼华埠大佬李松光来共襄盛举，请他担任欢迎会的共同主席。

10月20日当天，风和日丽，华埠广场上，搭了一个大舞台，台上挂上一面“欢迎福特夫人”的旗帜，台上也点缀了古色古香的灯笼，台下排满座位，气氛热烈。欢迎第一夫人的人群，数以百计，把华埠挤得水泄不通。贝蒂·福特驾临会场，看到这盛大的欢迎场面，显得惊喜，笑容可掬步下车子。

我和李松光陪同第一夫人在群众的欢呼与掌声中登台与群众见面。首先由我致简短欢迎词，我强调“福特夫人是第一位第一夫人来访华埠，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创举”。语毕立刻引起台下的共鸣，热烈掌声不绝。福特夫人致词时说：“今天的华埠之行是我自从为福特总统竞选助阵以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随后我代表了洛杉矶华埠赠送一件中式织锦短外套，李松光代表旧金山华埠赠予一件中式织锦长外套。福特夫人喜出望外，当场试穿，天真可爱的表情，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欢呼喝彩之声不绝。

李松光这时拿出他从旧金山带来的特制巨型幸运饼赠送给贝蒂。贝蒂带着微笑俏皮地问：“里面的幸运签说些什么？”李松光卖关子，给她个妙答：“这是高度机密，你得自己去打开来，才能发现！”贝蒂打开幸运饼，取出幸运签，上面写着，“贝蒂·福特，第一夫人，再来四年！”贝蒂这下笑开了怀，也引得台下一片掌声。最后，华埠舞狮队上台表演助兴，大会在锣鼓喧天和彩带纷飞中结束。

第一夫人首度访华埠之行非常成功，中外十几家新闻媒体都大幅报道，还引用福特夫人和我的致词重点。福特夫人是舞蹈专业出身，风度优雅，和蔼可亲，很能博取民众的敬爱，可说她是福特总统的一大资产。她的访华埠之行，为她的夫婿累积不少人气，争取到亚裔社区的支持，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造势宣传。虽然幸运签的预言并未实现，但是，第一夫人贝蒂·福特访华埠之行已成为历史创举。

吴黎耀华/文  
据《做不完的美国梦——六任美国总统顾问传奇生涯》(人民出版社版)

# 新中国最后一一起 驾机叛逃事件

1990年8月25日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这时，中方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 歼-6飞机突然失踪

1990年8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当时，值班员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

当值班员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首长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他让值班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 降落在了苏联军用机场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这时，中方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影

响。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为此，苏联当局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 秘密准备驾机叛逃

王宝玉，山东青岛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很多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笑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不再把他作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 被图154专机引渡回国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成了新中国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徐秉君/文 据《党史纵横》